

文苑笔谈

小说的戏剧性与日常性

龙悦

在“小说”跟“传奇故事”画上等号的古典时代,一部小说里的情节必须具备强大的戏剧张力,才能满足读者的胃口。许多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碰上的事,在小说里都理所当然地出现,不怕大夸张,就怕不够夸张。英雄救美、赤胆屠龙、剑侠奇缘、怒海余生,能怎么掰就怎么掰。本来阳光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写小说就写小说嘛,哪来那么多怪力乱神?但经过小说家语不惊人死不休地乱编故事加油漆醋后,读者口味越来越“重咸”,日常生活那种古井无波的日子遂进了小说的大厅,故事情节不夸张毋宁死,久而久之,小说世界奇则奇矣,却也跟日常生活渐行渐远,而在不知不觉中往娱乐的方向走去。

让我们看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她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夜讲到最精彩处,天刚亮了,使国王因爱听故事而不忍杀她,允许她下一夜继续讲。她的故事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她白首偕老。我们再从中国古代东晋史学家干宝著录的笔记体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有撒纬神学,有神仙变幻,有精灵物怪,有妖祥卜梦,还有人神、人鬼之间的恋爱故事,这一切都成了如今新奇幻文学的灵感之源。

照尼德格的说法,是福楼拜把小说从这样的戏剧性中解放出来。他举的例子是《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中有一段描述埃玛和雷翁相约在教堂私会的场景,本来两个人情投意合你依我依,没想到来了一位导游,碎碎念了一箩筐的话,把两人约会的情调都破坏掉了。尼德格认为福楼拜用这样的日常生活情境去呈现“那恒常并存的平凡性和戏剧性”。也就是说,那个无意中捣乱的导游虽然招人怨、招人嫌,但那样的场景比较真实自然,比较有文学性啦,否则一对恋人在公众场合谈情说爱了半天,竟然都没有半个人来打扰,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可是一旦“日常化”了,放了一个人进来,那教堂私会的效果便大打折扣,戏剧张力硬是被削去一半。虽然比较合乎一般的日常生活情景,但多数人更想看的,可能是那两人未受干扰时所发生的“天雷勾动地火”式剧情吧,但对于讲究日常性的小说家来说,偏不给你看古典小说中的传奇。

这里所说的戏剧性与日常性,可各自被视为类型小说与文学小说的基本特质。类型小说包含很广,从侦探、玄奇、探险,到爱情、武侠、科幻各种形态都有——基本上,这些小说均属“不夸张毋宁死”型,小说写得再怎么离奇巧合,都能被如痴如狂的读者接受。一个女子情伤自杀未遂,一路哭哭啼啼来到巴黎,不过上街买包烟,怎么就跌头散多年的旧情人,在街角转弯处撞个满怀?或是女主角无意中,相恋多年的男友原来是杀父仇人的儿子,要不就是男主角有一天突然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原来是某商业巨子的私生子,从天上莫名其妙掉下来一亿的遗产……

反正无巧不成书,所谓“巧合的手臂伸到长到脱臼”,情节不管怎么乱编,管它合不合理,读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索性两眼全闭,也就读下去了。记得不久前有一组“最强赘婿”系列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开始窝囊得要死,但一路演演下来,就成了地球之外九重天的“仙帝”了。这样的小说,竟然有上千万的点击量……

文学小说当然也营造张力,不过那张力来自日常生活,也就是“从平凡中呈现不平凡”,好比煮菜,要淡而有味,味精辣椒沙茶酱全不准放,这时候可就需要另外一种功夫了。

其实文学写作较大的快乐可能在这里。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有能力在别人看起来平淡无奇的事情中抓到不同的“眉角”,而这种发现正是写作者最大的快乐源泉。一旦看到新事情新角度,世界立刻大不同。不同的可能是细节,也可能是意义层面的东西,两者都可以丰富我们生活世界的内涵。

台北故宫博物院在1983年收藏的著名画家林寿宇的《绘画浮雕双联作》,是第一张列入故宫馆藏的华人现代画作。林寿宇中学毕业后前往英国习画。其作品低调简约,以白色为主体,其留白式画风影响不少后来之中国画家。1966年,大画家米罗曾造访他的工作室,并盛赞他对白色的处理,当今之世无人能出其右。林寿宇的艺术成就不仅享誉国际艺坛,也对上世纪80年代创作几何抽象形式的艺术家有深刻的影响,例如1984、1985年由他所发起与指导的“异度”“超度”空间展,体现其对材质、空间的探讨,及“几何抽象构成”的理念。评论家认为林寿宇的白色层次丰富,一层一层不同深浅的白色交错跌宕,令人叹为观止。

白色够平淡了吧?可是大画家就有办法在一片白色当中营造出层次丰富的世界,而不需要其他颜色来摇旗呐喊。音乐上也有类似的作品,拉威尔的管弦乐曲《波丽露》两个主题交互出现,旋律、和声、节奏不变,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因着不同的配器法而有不同层次的渐强音量,听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乐曲高潮,及至结束,才赫然发现已走过一段精致细腻的多层次音乐路程。这种近乎魔法的作曲与演奏,完整显现了艺术家从平凡处下手,却爆发惊人动力的能耐。

所以,小说需不需要那么刻意地追求戏剧性,以达到吸引读者的效果?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人生或可比作冰山,我们看到的日常生活事件往往仅是冰山一角,在它底下就有庞大的内容等待挖掘,小说家也许不必看得老远去找题材,只要低头深耕,可能就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啊。



留白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艺术家往往都是留白的大师,方寸之地亦显天地之宽。图为张大千作品《望远图》(局部)。

剧评

多面叙事的韩国检察剧

侯慧如

韩国律政影视作品向来以其尖锐的现实主义笔触、细腻的人性刻画而闻名。近年来,随着创作理念的更新和观众喜好的流变,韩国检察剧逐渐呈现出主题多元、视角立体、手法独到的创新格局。

以多元题材类型
全景展现检察职业风采

韩国检察剧打破了大众对传统律政剧的刻板印象,以其丰富的题材选择、生动的个性演绎,全面展现了检察官职业群体的光彩与魅力。

悬疑推理型检察剧是律政剧的经典题材。在韩国,该类剧作涵盖的案件类型,除普通刑事案件,如《秘密森林》中的连环杀人案、贪污贿赂案,还包含特殊类型以及针对特殊人群的犯罪;前者如《军检察官多伯曼犬》中的军事犯罪,该剧主要讲述了军事检察官都培万与他人联手,将以权谋私、背景强大的军团长送交法庭审判的故事,揭露了军检系统不为人知的一面;后者如《魔女的法庭》,该剧所涉案件主要是针对妇女儿童的犯罪,讲述了有“魔女”之称的检察官马利盾调到“女性儿童犯罪调查组”后,其所办理的包括性骚扰、性暴力、侵害性隐私、组织性交易等在内的案件,探讨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这些剧作以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精彩剧情,以及反差感十足的角色刻画、细腻的情感表达,无不满足着观众的观赏期待。

韩国检察剧不仅限于表现高强度的检案节奏,也关注基层检察官的工作日常。职场生活型检察剧以轻松明快的节奏和诙谐幽默的氛围演绎了检察官作为个人的喜怒哀乐,典型如《检察官内传》。该剧通过对某一基层检察院检察官工作日常的细致刻画,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角色形象。剧中没有生死一线、力挽狂澜的惊涛骇浪,而是以普通检察官工作生活的琐碎日常切入,穿插一些老百姓经常遇到的诸如坑蒙拐骗、家庭暴力案件,倾力打造了小人物式的基层检察官群像。《检察官公主》则从单视角切入,讲述了新人检察官的职业成长历程。这类检察剧在检案中填充丰富的日常元素,不仅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普及了法律知识、传播了正能量,而且有利于揭开检察职业的神秘面纱,打破与观众之间的时空壁垒,引发心理共鸣,激发人生思考。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影视剧观众呈现多样化趋势,玄幻架空型检察剧应运而生。该类检察剧赋予角色某种超能力,使其能够适时运用超能力,引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惩

奸除恶的快感。该类检察剧在法律规则和影视艺术的交融中也发展出不同的呈现风格。有的侧重悬疑烧脑的情节展开,如《吸血鬼检察官》。主角闵泰延因车祸去世后,重生成为一名吸血鬼检察官,他凭借吸血鬼“尝血闪回”的超能力,即吞下被害人的血液便可看到被害人遇害前所看到的景象,以此破获了一桩桩案件。该剧以短小精悍的模块化叙事,满足了当代观众时间碎片化的观影需求。有的则逐渐向偶像剧倾斜,如《再次我的人生》。该剧讲述了含冤而死的前检察官金溪宇重生后以检察官身份复仇的故事,通过流量明星酷帅的造型、正义又不失可爱的讨喜人设,深深吸引了新生代观众的目光。玄幻架空型检察剧在满足观众猎奇探险、惩恶扬善心理的基础上,吸纳了现代元素,为传统检察剧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但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不能脱离现实和法治土壤,该类检察剧需要警惕的是艺术表达的虚空化,以至脱离现实而无法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在某种意义上,韩国检察剧题材多元、精彩纷呈的创作与呈现,得益于东西方文化交融语境下,外来经验与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其深刻的价值隐喻无不彰显着创作者们对自己表达与观影认同的努力探索与孜孜追求。

以不同主体视角
多维度检视检察制度

韩国检察剧的切入视角逐渐跳出传统剧作的固有模式,在深耕检察官本位,特别是着重刻画男性检察官剧作的同时,也开始关注长期被边缘化的女性检察官,处于检察官对立的被告人、在正义感与自身利益间纠结摇摆的证人等对法治的理解,从而激发了大众对法治问题深切关注和思考。

从检察官视角审视罪案向来是所有检察剧的重头戏,韩国检察剧在承袭类型剧固有结构和元素的基础上,又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挖创新。一如《秘密森林》中黄始木因儿时脑部手术失去情感能力,从而能始终保持头脑冷静,秉持公平正义。众所周知,情感、偏见、利益等因素是检察官能够秉公执法的障碍。黄始木实际上是剧作者和整个国家理想中完美的检察官形象,这一角色属性使其能够成功规避上述干扰因素,这与剧中揭露的官官相护、贪赃枉法的体制黑幕形成鲜明对照,透露着法治对检察官公正立场的期待。

再如《魔女的法庭》和《检察官公主》另辟蹊径,将女检察官从男性主导职场的背景框中拉回观众



《秘密森林》海报

视野。此类女性题材的检察剧强调女性特质、女性成长及女性声音。剧中的女性角色个性鲜明,不再是扁平化、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她们是不择手段又柔软善良的“魔女”马利盾,也是得到成长蜕变的“检察官公主”马惠丽。该类检察剧将女检察官的光彩形象、性别优势、职场困境等予以直观展现,使律政职场的女性声音和女性诉求得到更多关注。

除检察官视角外,韩国检察剧还从其他主体视角反观检察体制,主要是被告人、被害人以及证人视角。至于如何实现反观,该类剧作一般会使用原本作为检察官的主人公,因特定事件成为被告人、被害人或证人,通过两种角色融为一体后所产生的不同思维间的碰撞得以实现。《检察官外传》和《被告人》两部剧作讲述的是原检察官被陷害沦为被告人后努力洗脱冤屈的故事。理论上,如果一个人是清白的,为何司法机关能掌握诸多有罪证据,甚至经过法庭审理后仍被判有罪?即便两位被告人均是精通法律、有丰富司法经验的前检察官,在沦为被告人后,洗冤之路为何依然艰难无比?这两部剧以被告人视角,分别从权钱等法外因素的介入、上诉渠道不畅、实物证据易被篡改等方面回答了这些问题。

《魔女的法庭》则从被害人、证人视角深化了检察官应有的感知力和同理心,一定程度显示了现有制度对被害人、证人保护的不足。该剧中,检察官马利盾在办理一起利用偷拍私密视频威胁他人的案件时,遭到报复成了被偷拍的被害人,此后她见到任何摄像头都如惊弓之鸟一般的表现令其真正意识

到,自己之前为了胜诉,将被害人是同性恋的隐私公然泄露的行为有多么不妥;本案开庭后证据不足,为使偷拍犯受到法律制裁,马利盾同意将自己被偷拍的视频提交法庭,此时她也深刻体会到,出庭作证并非易事,证人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以各类艺术手法
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一部成功的影视剧离不开剧情、创意、吸引力三元素。韩国检察剧通过悬念伏笔、冲突反转以及虚实相应等艺术手法,使得剧中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复杂多面,虚实意象相生相应,光影流转中余韵悠长。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韩国检察剧讲究谋篇布局,善用悬念和伏笔。一方面,巧设悬念,推进剧情。悬念是律政剧不可或缺的元素,韩国检察剧通常通过设置悬念来调动观众情绪并推动情节展开。例如,失忆的被告人朴政宇曾刻下的字,作为缉凶线索意欲何指,是《被告人》最大的悬念,也激起了观众的好奇与求解心理。随着剧情的展开和线索的涌现,其记忆也在真相浮现的同时涌入脑海,令人豁然开朗。另一方面,暗埋伏笔,积而后发。当被问到对韩国检察剧特别是悬疑推理剧的观影体验,相信很多人都会直呼“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韩国检察剧通常以不经意的细节描写来铺设剧情爆点的伏笔。细节描写与伏笔铺设是影视剧的通用手法,韩国剧作在这方面的特色是伏笔铺设自然又不落俗套,藏而微露,隐而后发,既不会一眼就能看出端倪,又能吸引观众入胜而



《检察官内传》



《被告人》



《魔女的法庭》



《检察官公主》

检察影视剧精品创作的密钥

刘晓莹

检察题材影视剧作为主旋律文艺的一个分支,其创作当然也应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为奏响新时代法治建设主旋律贡献力量。只有真诚直面现实,才能获得丰盈创作肥沃的土壤和不竭的灵感。

是综合艺术,作品的艺术性直接影响到思想性的传播力、接受度。电视剧《山海情》紧紧围绕故事和人物这三个核心要素,刻画出生动、可信的典型人物群像,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制作精良,是指创作各方面都精益求精,讲究而不将就。影视剧涉及的创作元素种类繁多,故事和人物虽然是决定作品品质最核心的要素,但服装、道具、化妆、灯光、音乐、特效等技艺水准,也同样是决定作品最终质量的重要因素。电视剧《人世间》以小人物生活变迁反映大时代的沧桑巨变,被称为“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播出后受到了广泛好评。虽然这是一部小说改编的作品,但仅仅是改编这项工作,编编就耗时三年。拍摄中,剧组搭建了数万平米摄影棚逼真还原了时代场景,精益求精的制作,既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也提升了观众的认同感。

新的历史方位,要求文艺作品在内容上反映新生活的时代。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时代新征程中,文艺创作应该把镜头聚焦在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人民丰富的生产生活上,只有真诚直面新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才能获得丰盈创作肥沃的土壤和不竭的灵感。

当下,中国的影视剧创作已被置于国家文化的战略高地。在大众传媒日益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讲好检察故事,扩大公众对检察文艺影视剧创作所要承载的重任和深耕的领域。检察题材影视剧作为主旋律文艺的一个分支,其创作当然也应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致力于讲好新时代检察故事,为奏响新时代法治建设主旋律贡献力量。

英国著名导演林赛·安德森曾断言:“电影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宣

传的力量。”影视剧作为受众群体最广泛的传播媒介,具有审美娱乐和社会教化双重功能。影视剧是一种和文学、音乐、舞蹈平等的艺术形式,当然具有艺术形式所共有的审美娱乐功能。同时,作为传播媒介,影视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其传播必然涉及具体价值观的输出,社会教化也因此成为其重要功能。

检察题材影视剧的教化功能具有复合性:既有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等道德教化功能,也有普及法律知识、培育法治信仰等法治教化功能,还有讲好检察故事、扩大公众对检察文艺的知晓度、参与度等检察文化传播功能。

著名小说家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和族群的局限。”文学是人学,作为叙事性文艺作品的影视剧同样是人学,理应秉持以人为本的

玩味叫绝。所以《秘密森林》中尹科长是杀害朴武成的凶手的真相被揭露时,观众才会顿感剧中穿插朴武成曾关照无良巴士公司等“无关”剧情用意颇深,原来尹科长的孩子因无良巴士公司使用不合格的车辆和司机,导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朴武成则是该公司的“保护伞”。当迷雾除去真相浮现,悬念得以解开,伏笔暗桩一激活,剧作由此形成完美闭环,也带领观众经历了一场极烧脑的头脑风暴。

为了使剧情具有张力和吸引力,冲突与反转的设置是画龙点睛之笔。一方面,韩国检察剧的创作,通过人与人、人与环境以及人与自我的冲突来点燃剧情。人与人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正反派立场的冲突,如马利盾与偷拍狂的法庭对峙;人与环境的冲突一般是个人的利益、诉求或价值观为社会所不容,典型如尹科长爱子心切选择私力复仇;人与自我的冲突则通过塑造人物的多面性格得以实现,剧中角色往往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如《秘密森林》中亦正亦邪的徐东宰、以黑制黑的李昌俊。创作者通常通过设置极端困境将冲突推至顶点,剧情张力由此得以产生。

另一方面,韩国检察剧通过反转叙事,挑战观众的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反转叙事是一种反直觉主义手法,通常需要通过一套情节设定,既构造显性图景以激活观众一般认知,引导其推测剧情走向,同时又嵌套一个隐性图景,偏离观众的认知逻辑,从而制造剧情反转,颠覆观众的想象,正如“幕后黑手”李昌俊最后舍生取义时,反转的艺术冲击制造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冲突制造紧迫,反转引发顿悟,正所谓紧张又刺激,意外又合理,韩国检察剧通过巧妙运用这两种艺术手法,带领观众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情绪冒险。

影视剧承担着再现外部世界的重任,但每一部剧作都有立意,都需要通过景、物、声这些可感知的意象来表现精神世界和灵魂色彩,达到影视观演的效果,进而通过光影、音乐、旁白等将剧中的情感流转、思绪万千流动到屏幕之外,使实在的感知引起情绪与思考的震撼美学。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重要的修辞技巧就是善于使用隐喻。韩国检察剧善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以虚实相应的手法昭示着景外之情、音外之声、言外之意。

《秘密森林2》将作为正义化身的黄始木检察官的出场场景置于浓浓大雾之中。黄始木独自一人开车行驶在崎岖昏暗的道路上,漆黑的夜色和窗外的迷雾使人不仅看不清前路,也无法分辨地何处,只能频频闪着雾灯缓慢前行。夜色深沉,浓雾缭绕,无不昭示着黄始木此行将要面对多少黑暗和迷茫;车灯闪烁着暗夜中唯一的亮光,微弱昏黄,却在黑暗中撕开了一道裂口,照亮了眼前的路;伴随着紧张又急促的音乐,以及李昌俊检察长缓慢而坚定的独白,车子缓缓前行,迷雾总会散去,黎明也终将到来。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韩国检察剧本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通过多元主题、多维视角与多类艺术手法的呈现,不仅从感官角度丰富了观众的观赏体验,也于无声处叩问着生与死、善与恶的人生哲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韩国检察剧也为我国律政题材影视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创作方面,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检察题材影视剧精品创作亦不例外。文艺作品只有朝人民创作,才能被人民所接受。检察题材影视剧作品同样要立足于写人,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反映检察人员的身边故事,创作“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题材,才能在更广的人群中被接受和理解。

美国文艺评论家布鲁克斯认为,结构良好的叙事会“激活意义构建过程”并实现“对意义的热忱追求”。当我们复盘分析所有既叫好又叫座的影视剧精品,发现无一不是叙事讲究的作品。而当我们反观所有评分较低的影视剧,总能从绝大多数作品中发现叙事方面存在的不足。

检察题材影视剧将诸多理念、信息,结合观众审美需求进行叙事加工,转化为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其所需的技巧难度更高。如何在艺术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双重规范下,平衡作品的审美娱乐功能与社会教化功能、平衡好诸多社会教化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当下检察题材影视剧创作的难点和关键点。只要攻克这一难点和关键点,就掌握了检察题材影视剧精品创作的关键密码。